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SHIJIE MINGREN JINGDIAN

SHIJIE MING
REN 经典
JINGDIANXILIE

世界名人自白经典 (二)

主编：张昌华 汪修荣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SHIJIE MINGREN JINGDIAN

SHIJIE MING
REN 经典
JINGDIANXILIE

世界名人自白经典 (二)

主编：张昌华 汪修荣 策划：梁春芳

116
96
:2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人自白经典/张昌华,汪修荣主编.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5.5
ISBN 7-5317-0900-7

I. 世... II. ①张... ②汪... III. 散文—作品集—
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1620 号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世界名人自白经典

主 编 / 张昌华 汪修荣
策 划 / 梁春芳
责任编辑 / 方 卉
封面设计 / 大盟文化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印 刷 /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50×1168 1/32
印 张 / 56.875
字 数 / 1,000,000
印 次 / 2005 年 7 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317-0900-7/I·885

定 价 / 165.00 元(全六册)

目 录

第二卷

- | | | | |
|-----|-------|------|------------|
| 247 | 〔波 兰〕 | 瓦文萨 | 我的早期经历 |
| 259 | 〔古罗马〕 | 奥古斯丁 | 忏悔录 |
| 264 | 〔法 国〕 | 卢梭 | 忏悔录 |
| 289 | 〔日 本〕 | 福泽谕吉 | 品行家风 |
| 306 | 〔德 国〕 | 尼采 | 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 |
| 312 | 〔英 国〕 | 罗素 | 我是怎样写作的 |
| 317 | 〔瑞 士〕 | 荣格 | 我与佛洛伊德之异同 |
| 327 | 〔英 国〕 | 汤因比 | 介于科学家和诗人之间 |
| 332 | 〔奥地利〕 | 波普尔 | 童年忆旧 |
| 342 | 〔法 国〕 | 萨特 | 七十岁自画像 |
| 357 | 〔德 国〕 | 歌德 | 自传 |
| 377 | 〔英 国〕 | 柯勒律治 | 华兹华斯对我的影响 |
| 387 | 〔英 国〕 | 德·昆西 | 服鸦片的痛苦 |
| 409 | 〔英 国〕 | 拜伦 | 自画像 |
| 412 | 〔法 国〕 | 米什莱 | 我的少年时代 |
| 420 | 〔法 国〕 | 雨果 | 向情人坦白 |
| 425 | 〔法 国〕 | 都德 | 来到巴黎 |
| 437 | 〔丹 麦〕 | 安徒生 | 我的童年 |

- | | | | |
|-----|-------|---------|--------------|
| 451 | 〔意大利〕 | 威尔第 | 威尔第自传 |
| 461 | 〔美国〕 | 大卫·梭罗 | 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 |
| 480 | 〔俄国〕 | 列夫·托尔斯泰 | 我的忏悔 |
| 495 | 〔美国〕 | 马克·吐温 | 我最初的写作生涯 |

【波兰】 瓦文萨(1943~)

瓦文萨，波兰前独立自治团结工会主席。1970年“十二月事件”和1976年“六月事件”积极参加者。198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本文节选自东方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的《瓦文萨自传》，题目为编者所加。

我的早期经历

父亲死后，我们总把继父当作“外人”。继父尽一切努力抚养我们，也许比一个生身父亲做得还要多。他还尽力公平对待我们4个孩子——他妻子在第一次婚姻中生下的3个男孩和1个女孩，我们从未看出他更偏爱自己的3个孩子，而是管教极严。乡村的生活条件当时是非常艰苦的：由于对土地分配的争吵，叔叔伯伯们之间连续20年基本不说话，只是在出席某个伯父或伯母的葬礼时才偶尔说上一句半句。（伯伯叔叔们的生活就是如此，当时显得很凄凉。）乡村长大的孩子的经历不同于城里的孩子。在乡村，甚至最小的孩子也要干活，因为有太多的嘴要吃饭，不允许有闲人。5岁时，我们就放鹅，7岁去牧场放牛，10岁照看其他牧畜，干各种

体力活，这一切都是在放学后干的。即使最机灵的孩子要想逃避一件特别困难或极为不快的工作，也要装出对学习某门功课有异乎寻常兴趣的样子。

我们有个4英亩的小农场。房子很简陋，没有电灯，波波沃在50年代末才通电。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一个个依次上了学（我们要走4英里路，时常赤着脚到学校去），留下小的做家务。每天下午至少有2个小时，我要把草切碎喂牲口，而弟弟们总是摆弄着切草机不放手。由于在牲口棚里的草堆上踩来踩去，几年后我的脚打起了厚厚的茧子，直到今天还隐隐作痛，这使我清楚地回忆起童年时干农活的情景。

我和我的哥哥们还利用额外时间去邻居的农场里干活；假期里我们4个人要去米哈尔斯基的砖厂从早干到晚。秋天，我们为买冬天需要的东西省吃俭用，节约每一分可以节约的钱。我母亲的表姐亚尼娜·布罗莱维奇姨妈常常从美国寄来包裹，这对我们帮助很大。邮包越大，我们越高兴，特别是姐姐伊莎贝拉更是兴高采烈。然而，我的母亲似乎对这种事情感到羞愧。她是个不愿接受任何人东西的女人，孩子们喜欢姨妈寄来的东西因此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就当时农村的一般条件来看，我们得到了母亲相当好的照顾。母亲一向穿着整洁，她也尽可能使我穿得漂亮些，总是把我打扮得干干净净，衣服是精心缝补和熨过的。屋子也是这样，经常进行粉刷，刷得白白的，地板总是擦洗得一尘不染，屋子里的一切都浸透着舒心的肥皂味。母亲对我们的精心照料，使我们有别于村子里的其他孩子。

今天，我几乎不知该怎样对我的孩子们讲述我自己的童

年，他们对那时的事情是很难理解的。谁能想到将近收获季节时我们会缺乏面包呢？有时我们2个月连一点面包屑都尝不到。今天，我仍记得在多布任用柴火烤成的面包的特殊滋味。我8岁时第一次去多布任给家里取面包。从波波沃到多布任要走一条6英里远的小路。我沿着小路左顾右盼地向前走，鲜花和小鸟使我着迷，我在田野上漫游；结果，当我到多布任时已经没有面包了，我只好空手而归……。在面包片上涂黄油或猪油是最好的美餐。在每年庄稼收获之前，我们每星期天都吃到肉，尽管肉极少。在冬天的午饭中，我们能吃到土豆和拌猪油的蒸面条。夏天，我们的饭食就好多了。我们是喝牛奶长大的，我们不卖牛奶，唯一的一头奶牛供我们全家享用。我们还经常吃到蘑菇和鱼：蘑菇是采来作煎饼配菜的，鱼是我们用网在附近池塘里捕的。

母亲不很喜欢农村。由于我们家周围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她一直准备带我们离开。继父对农村生活也没有多大兴趣；他想到其他地方去当一名“农业工人”。他找到了一个建筑队工头的工作，学会了为他的建筑队画草图，设计砖石建筑。他们建造教堂、农场和其他建筑，绝大多数都是木制结构。战后，建筑的活儿很少，继父挣的钱很难满足家里需要。他经常去城里，像人们在德国人占领时期所干的那样，挨家挨户地推销食品。他在经营农活上并不怎么走运：在当地长得很好的甜菜在我家地里一直长得很糟，他只能在甜菜收获季节到别家甜菜地里帮忙，尽一切可能打零工。

他对政治没有特别的兴趣，但喜欢收听装电池的短波收音机。晚上我们收听外国电台，我因此成了一个热心的听众，渴望听到世界各地的消息。从那时起，我懂得了从各种

不同渠道，而不是仅仅限于从单一的所谓“官方真理”来源获得消息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在罢工和暴力冲突期间，当1981年12月宣布军管法后国家内外通讯联系全部中断时，西方的短波无线电台（发射远距离传输信号）成了提供有关波兰事件消息的唯一来源。

在我们家里，对每项计划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要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但最后作出的决定都是无关紧要的。我因没有时间或不想给达奴塔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已经改掉了这种习惯。当我干活儿时，我总是聆听父母的指教。每当继父要去某个政府部门办理行政手续时，他总要和母亲商量每一步如何做、每句话怎么说，事先把一切都预想和安排得滴水不漏。例如他这样安排：“我敲门，然后进去说‘早上好，我有这样一件事求您给办……’。”我母亲就会插话说：“不对，停一下，你不要开始就说……”。他们没完没了地进行着这类谈话，常常逗得我发笑。我心想：“亲爱的父亲，在你进门之前你就会全忘光的！如果一个秘书撞到你身上，碰洒了她的咖啡，接着便指责你笨手笨脚，那你精心准备的那套话就全没用了。你不可能预见并安排好一切事情。”大多数情况下，事情的发展总与我父母预料的不同。他们接受既成事实，过于软弱，不能对外界进行干预，无力保护自身的利益。例如，一个玩忽职守的邮递员没能及时送来邮件。在我父母眼里，邮递员就代表了外部世界即“行政当局”。同行政当局打交道，他们是无力保护自身权益的。邮递员未来之前，他们积极做好准备，好像要参加一场激烈的战斗，可当房门打开邮递员进来时，他们却立刻软了下来，呆若木鸡。

作为孩子，我们很少争吵，从不咒骂任何事情，尽管有

时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父母之间常发生十分激烈的争论。争论一起，他们就会同时互说不止。我不参加争论，因为我十分明白他们此时谁都不会听一听对方在说什么，他们甚至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有一次，我想插进他们的争论。当他们的意见突然变得一致的瞬间，我讲了话，他们还真把我放在眼里。我17岁那年，有一天我对他们说：“现在，你们听我说！不论你们怎样看这件事，如果你们都抢着说，那你们谁也听不清楚谁在讲什么。坐下来，仔细想想，每个人说明自己的观点，都不要发火。”今天，我一起想起他们当时脸上的表情，仍然觉得好笑！后来，到了夜里，我听见他们又讲起话来：“他是对的，你知道，那是正确的办法……。”

我在这种环境中成长，扮演一个心中明白的旁观者的角色。我从不愿意与那种以既成事实同时宣称事情只能如此的世界妥协。每当有人想要说服我，让我相信有一种绝对的逻辑支配着人类全部行为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旅行者朝彼此不同的、常常是相反的方向走去的景象。火车驶向终点，火车的运动确定了这些终点。然而，如果你站在某个乘客的立场更仔细地观察，你就会看到，这个乘客数年一直乘坐从格丁尼亚到格但斯克的火车（这只是个例子），先是去他工作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然后返回他居住的格丁尼亚，他的住处正好与另一个造船厂相邻，上班和回家的路线完全相似。对另一个从格但斯克到格丁尼亚的乘客来说，除方向相反之外，情况则完全相同。因此在两个乘客的一生中，他们一直做同样的旅行。从早年起，我的注重实际的头脑总是想着这种荒唐事。我对童年的回忆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日常生活中支配我父母的种种动机和感情就像一本摊开在我们面

前的书。我仍记得他们一再重复的那些事情、他们的观念和他们的荒唐。我可以看到所有这一切对我父母的生活产生的影响。真正不幸的是他们太软弱。他们甚至吃不饱，缺乏必要的体力和信心，离开破旧的小屋，建造一座更好的新屋。他们总是谈到离开乡村去美国生活。但当1973年他们真的去美国时，却不是出于想去那里干一番事业。做出去美国的决定是出于一种家族中的共同看法和传统，即在我们家里总要有某个人在大洋彼岸。应该有人去美国，使家里其他人能够获得某种安全感和财政上的帮助。这种看法已经溶进了我们的血液。朴实的人按朴实的方法看待事物。

除直系亲属之外，我有表姐妹和学校的朋友作伴。我们都去查林上学。学校设在一个庄园主的小房子里，周围环绕着几个美丽的花园，房子和花园以前属于一家贵族，后来被剥夺了继承权。就功课而言，我是一种“全能运动员”，样样都通，样样稀松，哪一门学得都不精到。我的波兰文、音乐和图画就不很出色。然而到五年级时，我仍然喜欢做所有要求运算速度而不要求记忆力的算术和逻辑练习，而且成绩优异，甚至赶上了我们的老师。正是这位老师使我对体育产生了兴趣。他特别喜欢射箭，在他的指导下，我决定在射箭上一试身手，结果在地区比赛中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还赢得了一个真皮制作的球。尽管如此，同其他同学相比，我仍然不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学生，直到生活的警钟对我最后敲响，我才一举成名。我们的运动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夏天，我们常常跑到湖边，飞身跳进水里，尽力游得远些，直到气喘嘘嘘为止；我们也常去踢足球，但球是破布做成的，或者在里面填上马鬃。冬天，当池塘里的水结成冰块时，我

们便在上面玩耍，从一块冰跳到另一块冰，脚下就是5码深的冰水。从湖边开始跳起，谁跳得最远，谁就是胜利者，这是对勇气的考验。在这种比赛中，我经常战胜我的同学们，但在许多其他比赛中就不行了。

我第一次离开波波沃可能是我们在学期末的旅行。在格但斯克海滩，全班同学合影留念，日期是1958年6月2日。9年后我第二次去格但斯克，并在那里长期生活下去。

第二年，我永久地离开了家。按照母亲的建议，我上了利普诺一所职业学校，在“农业机械化”部学习一门训练课程。

我们地区的首府利普诺是一个拥有1.5万人口的大城镇，具有激动人心的悠久历史，曾有一段非常辉煌的时期。我在那里居住时，仍可看到一些记载着昔日光荣的历史遗迹：墙壁上的纪念装饰告诉人们在君主共和时期，多布任地区议会经常在这里开会；古老的教堂高耸于山巅，在它的周围各种货车正通过狭窄的街道赶赴市场。当地精力充沛的农民，包括波波沃村我的邻居们都来此地购买东西。我们的学校位于城外，同一座宽阔而宏伟的公园相毗邻，公园入口处有一块凸起的地面，上面矗立着一座圣安东尼的雕像，俯瞰着周围所有的建筑物。这座圣安东尼的雕像也许是用来保护利普诺居民，特别是年轻姑娘们免遭学生们的骚扰，因为学生在城里的名声可不太好。

学校的任务是要在3年的时间里把像我这样毫无技术专长的人培养成有用人才，分配到国营农机站（POM）、或城市和波罗的海沿岸工业城市那些正在招募青年人的其他工业部门。教学内容侧重于那种结业后就能实际应用的专业训

练，而像波兰文、数学、历史、地理等一般课程则只限于教授最基本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即使最平庸的学生也不感到困难。然而，有些教师总想要改变训练教程的平庸水平，教给我们更多的知识。我自己对工厂实习课特别感兴趣，各种各样的设备任我们摆布，在这里我可以说已经学会了自己这一行。我在其他科目上的成绩被认为是“满意”。我的期末成绩单上得了两个“优”：一个是商业管理课，一个是体育课；我的品德课成绩居然是“极好”，这实在令人吃惊。

然而，正是这种品德课成绩给我造成了许多麻烦，教师委员会按照我的品德课成绩不止一次地找我的错。为了接受学校的特殊训练，我们离开家吃住在校，然而我们经常旷课，去城里寻找刺激。我们有几次违反禁令吸烟和不戴学生帽四处游逛被校方当场抓获。在轮到我做助理督导员时，我因学校给我加上了“多次吸烟、经常捣乱”这样的评语，便总想挽回自己的坏名声。雷巴茨基先生是我们的督导员，也是学校未来的校长，总想找岔儿难为我。他总是让我去做不好干的工作，可我都很好地完成了，还赢得了一个优秀组织者的声誉。我从未与同学们闹翻过。我在值日时总比平时提前半小时叫醒大家，在这段早起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干活，直到早餐的美味飘进走廊里。每当我们完成分配给我们的工作，大家总是兴高采烈。

我必须说历史课是我的弱点。有一个学年，我在期末考试中三次不及格，这真使我为难。当时我还不懂得历史知识的价值，直到很久之后才明白过来。我当时认为，历史这门课程似乎远离现实生活，很抽象，其中的人物和事件与我所知道的现实联系太小。总之，要从波兰民族的观点来理解世

界历史，50年代可不是一个理想的时期。那个时代盛行的是带有倾向性或者说推测性的分析方法，这是根据外国的观点精心设计出来的，运用的是共产主义的阶级术语，从永远存在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阐述事实。我则更倾向于反对以这种模式看待世界，因为我在家里和教堂里听到的关于世界的情况与此根本不同。也就是说，我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这些看法是凭依我自己的经历和我与同学、老师以及所有我在生活中广泛接触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形成的。

我有10几张业余时间里拍摄的照片，可惜照片的质量太差，这些照片是我在技术学校学习的那段时期的见证。照片上没有注明日期，但我想是在最后一个学年，我当时即将进入弱冠之年。这些照片上是4个男孩、2个女孩，他们的年龄不相上下，都穿着他们认为当时最时髦的服装。我穿的是瘦腿裤，浅色衬衫，脖子上系一条丝绸巾。照像机（可能是我一个朋友的），拍下的姿式显示我当时正在模仿花花公子的样子。几乎每张照片里，我都要把这个或那个女孩子拉向我身边，而我的那些男同学只是扮演多余的角色。我在照片里的姿态透着一种做作的若无其事的神情。而女孩子们看上去想要摆脱我，她们面带羞色，同时又显得愿意让我拉着的样子。这些照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我那时显得十分自信，我的表情和姿态显示着自满的神情。不过那只是一种装腔作势而已。

1961年学期末举行的舞会也标志着无忧无虑的学习生活的结束。现在我将走向工作。不久我在洛霍齐诺农机站当一名电工。这是一种维修电气设备和机器的工作，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项新工作。正是在这时，人们首次称我为维修“高

手”。两年后我应征入伍；1965年，我复员回家，重新在农机站干我以前的工作，不过这次是在离波波沃更近的列宁分站。此时家里的孩子们已纷纷离去：伊莎贝拉在通过技术考试后即结婚，去了索哈切夫，在那里的一家工人自助食堂工作；现在她是个家庭主妇，仍生活在那里。爱德华也很快独立了：他进了一所建筑工程学校，毕业后辗转于许多建筑工地，最后在罗兹附近安定下来，一直经营自己的农场。斯坦尼斯瓦夫先是在职业学校学习，然后去服兵役，接着在比得哥煦定居下来，一边工作，一边读技校。就这样，我现在成了家里的老大。

在当时波兰农村的社会环境中，农机站就是变革的同义词；它表示了一项新的农村政策：建立集体农庄，没收私有财产，以新的农业机械化代替波兰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一种新型的农业工人应运而生，他们既不归属城镇，也不归属农村。农业工人在机务站工作，固然是为了谋生，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捞到零配件、机器和用于种好自己一小块土地的其他物品。农村人按自己的旧习对这种“新生事物”做出反应：农机站的工人在本该维修拖拉机和国营农场机械的上班时间里给自己干活；各种黑市纷纷出现，视察员对此熟视无睹。他们十分清楚，私人农场不论怎样落后，仍然是当地主要的农业资源，并且需要机械设备。这对农村集体化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反抗力量：理论上的计划被扭曲，以适应现实。

该怎样形容这时的农机站工人呢？他们身穿折线清晰的粗布工作服，头上歪载一顶旧式贝雷帽，样子十分怪诞，衣兜里总是装着工具，而这些工具很容易被丢得无影无踪。对于我们提供的小小服务，村子里全都“以物支付”，经常是

用酒。农机站工人的技术越熟练、越全面，大伙儿对他的“妙手回春”和帮助人的能力的赞扬就越多，尤其是得到姑娘们的赞扬。

在农机站，我已赢得该地区，即方圆 20 英里内最佳技工的声誉。从耙具到电视机，从 WFM 到雅瓦牌摩托车到弗拉尼亚牌缝纫机，我样样都能修理。我认为我是个重要人物。每当我去参加舞会，刚一进场就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瓦文萨来了！乐队立刻活跃起来，桌上摆的有一瓶伏特加。我很趁几个钱，认识所有的人，因为给他们修过东西。我经常干些别人讨厌干的琐碎话。不是人们来找我，就是我去人们家里。我算个人物，我似乎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但就在一天的下午，我不得不彻底地摆脱这项工作——我已突然感到自己极度厌恶这种工作。农机站对我来说似乎是个死胡同，令人窒息，终于竟至难以忍受。我突然强烈地感到，我那个农机站和全地区最佳机械工的声誉是多么地幼稚、多么无足轻重而又荒唐可笑。我无法忍受别人嘲弄——那种口中不说、目笑存亡的真正嘲弄；我亟需采取严肃的行动，做出努力，来肩负一定的重任。我自忖这种想法仅仅是由于我禀性矜夸。此外，还需要说明一下我同一个小年轻女人之间的事情。那不是真正的爱情，而是一种我不能断定而又一味坚持的关系。这个女孩子出于实际目的为我们双方做出决定，尔后又解除了它。我并不感到真的悲伤，但我感到孤独和空虚。人们那时都认为我们会生活在一起的，但最终她抛弃了我。这是一次对我的骄傲的强烈打击。此后，我就决定远走高飞。我也感到羞愧，因为我母亲盼望我有出息，我必须做点事情。我已经 24 岁，却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

就，我感到自己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因此，在那天下午，我迅速做好了离开农机站的准备，不曾感到有一丝的后悔之意。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把握，于是回到家里，然而又难于启齿告诉任何人我正在做出的重大决定。我只简单地说，我要离开农机站，我要换换环境。我带上一些钱和一件外衣，奔向多布任车站。

为什么要到波罗的海沿岸呢？在当时，这似乎是因为我到车站后第一列离站的火车是经格但斯克驶向格丁尼亚的。但今天，我更加明白了为什么要到那里去；重要的决定从来不是像那样做出的，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那里有大海；那一次学校旅行曾给我留下某种一望无垠、向远方无限延伸的东西的印象——这也许就是自由。一个大城市、一个港口、冒险，就像鳗鱼般本能地随波逐流，让我漂向大海边的波罗的海地区，漂向远方。在海边，我终将发现自己的特长而大显身手，或者被大海所吞没。

（彭志毅译 张金鉴校）